

## Research on Mao Zhenxuan's Study of "Miao Jiang Ji"

### 毛振翎的《苗疆集》研究

Yang Ting<sup>1\*</sup>; Fan Jia<sup>2</sup>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hua University, China  
Email: 1617578138@qq.com; 5941367@qq.com

Received : 3 February 2025  
Accepted : 21 March 2025  
Published : 30 March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Abstract

When Mao Zhenxuan, a Chinese poet in the Qing Dynasty, served in Guizhou, he left two volumes of the poetry collection of The Miao Jiang Collection. The study,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s,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Miao Jiang Collec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Mao Zhenxuan's poetry creation during his tenure in Guizhou.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them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paradigm of Miao Jiang Collection, and finally summarizes its historical valu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oems of Miao Jiang Collection not only vividly depict the natural and precipitous and folk customs of Miao Jiang, but also recorded the military conflict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he border govern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Moreover, the spirit of self-annotation and factual recording in the poem enhances its value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his study holds that Mao Zhenxuan's Miao Jiang Collection is not only a model of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frontier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 Keywords

Mao Zhenxuan; Miao Jiang Ji; Poetry Research; Qing Dynasty

#### 引言

毛振翎（1686—?），字翥苍，号半野居士，四川华阳（今成都）人。雍正九年（1731），毛振翎官古州同知，并于雍正十年（1732）抵达贵州。任职期间毛振翎在当地创办义学，大兴文教，黎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3：183）称毛振翎“文雅化俗，德惠群黎”。作为清代边疆治理与民族文化互动的独特见证，毛振翎的《苗疆集》以其417首诗系统地记录了清雍正至乾隆初期贵州苗疆地区的地理风貌、军事冲

突与族群互动。这部创作于1731-1738年间的诗集（胡万梅，2020），不仅承载着士人官员的边疆治理实践，更因其“诗史互证”的实录精神，成为记录清代“改土归流”政策下苗汉关系的重要文本。

“苗疆”一词出现于明朝，当时的明朝统治者用“苗疆”来指称今天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广大区域，又被称为“苗界”或者“生苗界”，苗疆的范围也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在不停地发生变化（韦凯，2024）。清代改土归流后清雍正开始开辟苗疆，此时所言之“新辟苗疆”，狭义上是指贵州东南部的苗族聚居区，而苗疆又以古州为中心。本研究所指的苗疆，即毛振翎的《苗疆集》中的苗疆，亦即毛振翎的任职地古州。当前学界的既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毛振翎的《西征集》的研究上（如胡万梅，2020；陆昕，2020；王虎、张邦伸，2020；王军涛、张建强，2022；成飞，2024），而对《苗疆集》的研究目前尚处拓荒阶段。《苗疆集》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在场者”的视角，比如通过“黔山初得路”（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5）的交通书写，可以佐证雍正朝驿道扩建对苗疆经济网络的改造；通过“青衣返棹畏江寒”（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9）的服饰隐喻，可以揭示苗汉文化接触中的认知差异，等等。因此，对于毛振翎的《苗疆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在分析诗歌的地理书写、战争叙事等主题形态基础上，深入挖掘诗歌意象、自注体例与审美范式中潜藏的治理逻辑。本文最终论证，毛振翎的《苗疆集》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典范文本，更是解读清代国家与边疆互动机制的重要史料。

## 研究结果及探讨

### 一、多元主题书写

毛振翎在苗疆任职期间从未间断文学创作，笔耕不辍。将《苗疆集》中的诗歌主题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苗疆地理风物、战争叙事、士人情怀三大类。

#### （一）苗疆地理风物的书写

贵州省地势西高东低，由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降低，地貌类型复杂，不仅有高原（海拔在2000米以上的威宁、赫章、水城一带，海拔在1000-1450米的黔中丘陵状高原）、山地（乌蒙山系、武陵山脉、大娄山脉、苗岭山脉地区山地）、山原（如黔北、黔中南地区受侵蚀切割、溶蚀的高原），还广泛分布着丘陵、台地、盆地（坝子）

及河流阶地（陈建庚，1994），这样的地形地貌条件使得贵州地区的交通并不发达。在《三难滩舍舟山行》中有“林深孤戍警，滩急客航惊。断壁扳藤过，危梯倚杖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5），毛振翎通过“孤戍”“险滩”来呈现苗疆地理之险。贵州省盘州市亦资孔驿是黔滇驿道的终点站，黔滇驿道自贵阳上至亦资孔、西进云南，是云贵地区与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雍正五年，鄂尔泰改建黔滇驿道，新路延伸至亦资孔驿，避开了险峻路段，使得驿道更加便利安全。《资孔驿》也可以印证当时的贵州拓展驿道及疏浚整治河道后交通更为便利，同时也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黔山初得路，岚气静飞尘。谷鸟惊残梦，岩花惜去春。云间无旧侣，雨际有征人。翰尔农桑客，翛然此一身。（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5）

黔山是贵州贵阳的黔灵山，被称为“黔南第一山”。此诗为毛振翎从云南去往古州路上经过亦资孔驿时而作，此时新路刚延伸至亦资孔驿不久，因此才有了“黔山初得路”，同时也写出了黔道的险峻以及山路新辟的艰难。尽管此道才刚开通不久，却已经有不少的农桑客经过此路发展贸易。

古代贵州因其地理位置偏远且交通并不便利，与中原地区联系较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毛振翎的《中秋登武乡侯台》中就提到了苗疆地区特有的洞酒和芦笙：

片云孤鹤思悠悠，控理何曾展一筹。万岭兵销皆好夜，三江浪静不惊秋（车溶都为三江）。沽将洞酒催新咏，更听芦笙（苗民所吹）按野讴。爱是武侯台上月，千年犹为后人留。（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0）

身处异乡的毛振翎于中秋佳节登上武侯台望月思乡，以明月为纽带，将历史追思、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融为一体，既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敬仰与遗憾，又展示了对和平生活的珍视与欣慰。此时喝的是黔东南地区与湘西少数民族特有的“洞酒”，耳边传来的是苗民所吹的“芦笙”。清光绪《湖南通志》：“洞酒出永顺。”清光绪《永顺县乡士志》：“酿酒造酒之法，合白酒、黄酒两法为之，不刚不柔。”清光绪《龙山县志》：“呷酒用高粱，复月浸以山泉，置竹管瓮中汲之，最能解渴，称洞酒，土人喜欢饮之”（彭雪开，2014）。这三处提到的洞酒，就是指那些生活在山中小平垅的土家人及苗人。芦笙是苗族人民的传统乐器，由笙斗、笙管、簧片和共鸣管组成。与芦笙相配合的还有苗民的芦笙舞，每年当苗族的芦笙节到来或者逢年过节之时，苗

族男子吹响芦笙,女子便配合上芦笙舞,“一听芦笙响,脚板就发痒”,芦笙与芦笙舞配合得相得益彰,让客民感受到苗族文化的力量与激情。毛振翎在此生活多年,也写下了不少赞美苗族洞酒与苗族传统乐器芦笙的诗歌,如《思恩杂感》中的“风雨满天登不得,芦笙一曲下红苗”(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39),毛振翎也在诗中自注“芦笙乃红黑两种苗民所吹”;《苗俗》中的“欲志侏俪俗,依稀太古封。曲说芦笙好,尊夸洞酒浓”(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53),“侏俪”指苗民语言“侏离”,暗含“异质”意味,“太古封”将苗民社会比作上古遗民,既显其淳朴,又暗示其“未开化”状态。这些诗歌不仅描写了苗民的特有文化,更传达了苗民与汉民在文化上的互动与融合。

## (二) 生动写实的战争叙事

明清时期贵州地区长期处于军事动荡状态,清王朝通过多次军事行动逐步强化对西南边疆的管控。康熙朝先后平定南明残余势力及吴三桂叛乱后,至雍正年间为推进边疆治理体系改革,实施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边疆政策。在此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与巡抚张广泗等边疆大员主导了针对“生苗界”的军事行动,霸占苗民土地,建立“军田”、“屯田”,各种税收、苦役使苗民流离失所,苗疆社会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由于清王朝强势且迫切地想要推动清廷对于西南边疆的直接统治与思想文化传播,使之与苗民社会本土文化发生矛盾冲突,而汉人客民又对苗民土地进行侵占掠夺。雍正六年(1728)至雍正十三年(1735)间,贵州苗民反清斗争频发,苗寨义军几乎占领了整个黔东南地区。雍正十三年(1735)2月,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席卷整个“新辟苗疆”的“雍乾苗民起义”,雍乾苗民起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苗民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这场反清斗争由苗民包利和红银领导。激起苗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贵州地区苗多民少,但是苗民在承担各种苦力徭役的同时还要受到客民的欺压。

古州镇总兵韩勋闻讯后派遣游击唐开中、向之荣带重兵至王岭汛阻击,义军被迫退回高表。“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十六,逆苗数万攻犯,王岭营游击唐坚壁,夜待以五百兵堵御,踰城追击,苗尽败北”(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0),但是这次反抗并没有就此结束。三月初,台拱、清江义军领袖会于台拱方商议军情,决定分兵攻下莲花屯汛和清,江厅城。十二日,义军围攻莲花屯汛。月底,义军已增至两万余人,一举攻下台拱厅城,官军退避镇远。之后义军以鸡摆尾、控拜、台雄为据点,分兵进击清军。四月,义军大举进攻东

路清江义军围清江厅、柳受汛，分军合镇远义军克邛水司、占青溪；西路上九股台盘、丹江、清平义军占凯里，克清平县城；中路包利合台拱义军联合黄平、施秉义军克重安江，围胜秉、旧州、岩门司、新州、余庆；随后义军占据凯里、重安江、黄平。至此，贵州清军官兵“征调殆尽，逆氛四起，奔救不退，驿路阻塞，省城戒严”（魏源，1984：293）。云贵总督尹继善立即向其他省份请求支援，但是到了五月，苗民起义军已经覆盖了整个黔东南地区并且得到了各地苗民的响应，起义军声威大震。毛振翎在其诗歌《雍正十三年乙卯四月望，四抚提会委同游击唐，共领兵七百与清江兵会军次康，黄坡苗万众于诘，朝犯营一战溃北，赋此以志之》中描述了这场战争在四月时清军艰难抗战的景象：

壁累森严刁斗鸣，兹行人指作长城。三山金鼓军声壮，七部风云妖气平。踞险貔貅争北向（蠢动逆苗在古州之北），负隅豺豕望南惊。诘朝一战非容易，自此顽苗畏我兵。（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0）

全诗以生动激昂的语言记录了清军平定苗疆叛乱的场景，情感的转变从战前的紧张戒备状态到战时的艰难激昂再到战后的充满自豪，表达了毛振翎对于清军胜利自豪与对边疆稳定的信心。但是战争并未就此结束，雍乾苗民起义维持了近两年，直至乾隆元年（1736）在滇、蜀、楚、粤等省派出的 23000 余名汉土官兵的围剿下才最终得以平息。毛振翎洋洋洒洒写下了一首百字古体诗《平定苗疆歌》：

苗生宁止百万众，狼奔豕突无人控。我民来往经其边，少捆老缚掠入峒。父子痛心欣当位，乞入顽巢晓以义。深崖巨壑虎负隅，宛转劝民只可弃。剧怜相思不相见，共泣苗强汉人贱。苗疆乃在中国中（在楚粤黔三省三间），非比边陲任其便……万群稽首泣辕门，感独生全谢天泽。便此卷师息力，楚粤川滇各返域。尚留分戍善后谋，永清天末年万亿（余于古州雍正十二年腊月除夕，曾梦“永清天末”四字悬于天表，意以为苗疆自此定，故喜刻一额于堂后。岂期三年春，苗民复变，大加剿洗，乃获平宁，继想永清大定乃武王事，盖主征，诛而后天末永清也，应并志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7）

全诗记录了清廷平定苗疆叛乱的大体经过，既有对苗民叛乱的描述，也有对清军全力平叛的赞颂，同时融入了毛振翎对边疆治理的思考。通过生动的叙事与深沉的情感，既描绘了叛乱的残酷与汉民的苦难，也赞颂了清军的胜利与苗民的归顺，最终以“永清天末”四字寄

托了自己对边疆长治久安的期许。全诗既是历史的实录，也是清代士人对国家统一的文学表达，展现了清代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 （三）悯民与自省的士人情怀

毛振翎的诗歌创作深受儒家诗教传统的影响，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和教化意义。他的作品常常体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关注社会现实，表达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在其《苗疆集》中，士大夫的忧患意识贯穿始终。他的忧患意识既表现为对苗民疾苦的深切悲悯，又反映为对自身仕途与道德使命的反思。这种“悯民”与“自省”的双向精神运动，既是儒家仁政理想的诗化实践，同时也折射出清代朝廷边疆官员在国家治理与个体情感之间的矛盾纠结。这种复杂情感在毛振翎的《苗疆集》中主要表现为其对于民生疾苦的实录书写以及毛振翎陷入的士人身份的精神困境两个方面。在《偕永从令陈磊峰年侄自丙妹返舟》中有“白鸟寻巢愁日暮，青衣返棹畏江寒”（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9），诗中的“青衣”指的就是苗民。苗寨的苗民大多数喜欢穿着青色衣服，因为古代苗民的印染纺织技术比较落后，且交通不便，只能用天然植物对衣物进行染色。因此，古代文人就常以“青衣”来指代苗民，既是因为其服饰特征，同时也隐含了“未开化”的意味。毛振翎在这首诗中借物象隐喻苗民生存的艰辛，暗含了对苗民生存状态的关注。《奉使开下江歌》记录的是朝廷为苗疆治理水患的经过：

三江水汇洞门前，势大声豪浪拍天。去路纡盘复隘窄，往往倒流民命悬。甲年夏水涨楼头，人在屋梁呼救舟。飞舸千片挽沉溺，溯洄往事使人愁。几欲洩泻术不得，满城官吏心悽恻。那能远害献良谋，凿山筑堤计总拙。安澜终自待神明，且向滩头治水平。石如虎豹江心立，行人触之不可生。督工眠食江之浒，利济生敢辞苦。火焰烛天金震地，石碎波澄帆无阻。六千猛士驻新疆，食货年年运粤航。舟子临滩翻喜色，往来共说今平康。南柳州兮北古州，万项恩波颂君侯。波光千载永不断，恩光似木亦同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8）

“纡盘”“隘窄”将水道的险阻情况展现，“倒流”喻指水患无常，“民命悬”直陈百姓生存危机。以“虎豹”喻江心巨石，凸显治水工程的艰险。“不可生”写治理水患对行人的危险，同时暗含作者对治理人员命运的关切。“眠食江浒”写督工与民同甘共苦，“利济生”则体现了毛振翎儒家仁政理想。

贵州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形地势条件使得自古以来贵州的农业并不发达。而农业生产离不开充足的降水量，毛振翎的《苗疆集》中有不少关于农业生产后感叹雨水来得及时的诗歌，如《喜雨》记载了军屯初立，移民开垦了大量田亩后天降甘霖时的喜悦，同时也体现出毛振翎以民为本的情怀：

炎荒极目惨蓬蒿，军士新屯望泽带（时初立军屯）。石燕藏云飞不起，烛龙挟日焰偏高。雷声忽动千峰暗，雨势初来万木号。（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9）

在《中秋登武乡侯台》中毛振翎曾通过“爱是武侯台上月，千年犹为后人留”（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0）来表达自己想要以文治教化边疆的理想，后来毛振翎曾在古州办义学教化苗民，当时已有少量苗民学生在义学学习。《寄呈黔方伯安州陈廷彦前辈》中有“愧无一策善苗疆，别后公偏入奏章（予在古州教化苗童，有入弟子庠者六人，为公附奏）”（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573），此时的毛振翎对当时的苗疆治理成效并不满意，对此也充满了自责与反思，但是“文治”已初见成效，已有苗童考入官学，这又令毛振翎感到欣慰。

毛振翎在苗疆任职期间的文学创作，不仅展现了贵州地区复杂的地理风貌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还通过生动的战争叙事和深沉的士人情怀，揭示了清代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与重要性。他的诗歌作品不仅是对苗疆地理风物的细致描绘，更是对苗民社会与汉民文化互动的深刻记录。通过对苗民疾苦的关怀和对自身宦途的反思，毛振翎的作品也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展现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仁政理想。

## 二、艺术特色与审美范式

### （一）巧用意象与用典

毛振翎在其诗歌创作中，最为显著的表现手法为意象与用典的运用。其诗歌意象的选择与其人生阶段密切相关：早期，毛振翎身处乡村生活，其诗歌中多采用田园意象，以表现其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晚期，因壮志未酬，其心境转向隐逸，故多选用梅、鹤等象征归隐的意象，以寄托其超脱世俗的理想。而在其仕宦生涯的中期，毛振翎任职于苗疆，适逢战事频发，其诗歌创作自然融入了大量战争意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个人境遇。这一意象的演变不仅体现了毛振翎个人情感与思想的变化，也折射出其诗歌创作与时代背景的深刻关联。其诗歌《雍正十三年乙卯四月望，四抚提会委同游击唐，共领兵七白

与清江兵会军次康，黄坡苗万众于诘，朝犯营一战溃北，赋此以志之》就蕴含了丰富的军事意象：

壁累森严刁斗鸣，兹行人指作长城。三山金鼓军声壮，七部风云妖气平。踞险貔貅争北向（蠢动逆苗在古州之北），负隅豺豕望南惊。诘朝一战非容易，自此顽苗畏我兵。（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0）

“刁斗”和“长城”构建了战场肃杀氛围；“貔貅”为神话瑞兽，象征清军勇猛善战；“豺豕”贬斥苗民为贪婪卑劣的兽类，从道德与力量两方面一起贬抑此次苗民起义战争。在《鸡贾河》中毛振翎用“狼穴”来贬斥苗民聚居地为狼的空间，否定其防御正当性，而“天兵”以天命所归的修辞神化清军，肯定此次收复苗疆的合理性。

毛振翎以才气写诗，善于使事用典。“郭李同舟”典出《后汉书·郭泰传》，记载东汉名士郭泰与李膺同舟渡河的故事，郭泰与李膺均为东汉清流名士，以德行与才学著称，同舟象征志趣相投、彼此敬重。众人“以为神仙”，凸显了二人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后世就以“郭李同舟”喻指君子之交或同僚间的深厚情谊。毛振翎的《偕永从令陈磊峰年侄自丙妹返舟》中就有这一典故：琴书满载聊医俗，郭李同舟好寄欢（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9）。诗中以“郭李同舟”赞美同行者陈磊峰的志同道合，表达同僚间的深厚情谊。巫山神女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典故源自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巫山神女通常被认为是天帝之女，名为瑶姬，居住在巫山之上。她的形象美丽而神秘，常与云雨、山水等自然景象联系在一起。《都江岸上桃花》描绘了诗人在都江岸上观赏桃花时的所见所感，既有对自然美景的赞叹，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诗云“态如神女凌波去，色似明霞映水空”（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9），诗人将桃花的姿态比作“神女凌波”，形容桃花轻盈、飘逸，仿佛仙女在水面上翩翩起舞。这里的“神女”就是指巫山神女，通过运用巫山神女的典故进一步增添了桃花的神秘与美丽。

## （二）实录精神的传承

毛振翎作诗常用自注来对自己的诗歌进行补充或解释说明，同时，作为雍乾苗民起义的亲历者，他与杜甫一样目睹战火纷飞，实录精神是其苗疆诗歌的基本内核。他的诗歌《雍正十三年乙卯四月望，四抚提会委同游击唐，共领兵七白与清江兵会军次康，黄坡苗万众于诘，朝犯营一战溃北，赋此以志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0）创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月十五日，记录了清廷在贵州苗

疆平定叛乱的一次关键战役。据诗题可知，四抚提与游击唐某率七百清军联合清江兵，于康地（今贵州境内）会师，与黄坡苗民起义军对峙。次日清晨一战，清军击溃苗众，此诗为纪念此胜而作，兼具纪实性与颂扬性。毛振翎还在诗歌中自注“蠢动逆苗在古州之北”，不仅标注地理信息，更以“蠢动”一词强化清军视角下的苗民形象。《抵古州界寨麻》以细腻笔触，真实记录了清代古州苗族社会的文化习俗、社会组织与历史变迁，体现了毛振翎对边疆民族生活的深入观察与忠实呈现：

土宇初开故习存，为传洞话细评论。（洞苗必得通事以洞话相传）。头颅裹帛非关孝，（苗人半以白布缠首），发际标翎是未婚。（未娶者顶插鸡毛）。沃壤连梯堪献赋，（苗田依山，多作梯形），危楼比户自成村。（苗寨尽楼）。一从华鼓兵销后，（合寨建重楼约五六层，上置一鼓名华鼓，与邻寨有怨则鸣，聚众议兵，今其鼓尽毁），无复斧头压崽门。（苗人大寨为爺头，小寨为洞崽，偶不愿斧头与兵攻寨，今此风尽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0）

诗中用了多处自注来对诗歌内容进行解释：“洞苗必得通事以洞话相传”、“苗人半以白布缠首”、“未娶者顶插鸡毛”、“苗田依山，多作梯形”……苗族的风俗（如白布缠头、插鸡毛为未婚标志、梯田耕作等）与汉文化差异显著，自注通过直接说明具体细节（如“未娶者顶插鸡毛”）。同时，诗中的自注还有补充客观细节的作用（如“苗寨尽楼”“华鼓”功能），将诗歌从单纯的文学表达升华为社会实录。这种细节的真实性强化了诗歌的史料价值，也体现了诗人对苗族社会观察的严谨性。

### （三）沉郁浑雄的风格

安史之乱期间，杜甫因战乱被迫迁徙，最终带领家人迁居蜀地。在蜀地生活的近八年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描绘当地风物的诗篇，这些作品对后世巴蜀地区的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蜀中诗人的毛振翎受杜甫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实录精神的传承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还表现为其诗歌创作展现出的沉郁雄浑的风格。对比于毛振翎诗歌创作的前期与后期，前期的诗歌风格偏向于清新自然，后期偏向真挚醇厚，诗风演变与其苗疆诗歌所体现的沉郁雄浑的审美范式形成鲜明比照。造成这种风格演变的原因是其远大的报国志向以及心系百姓的情怀。尽管毛振翎足迹广阔，但是在他眼里，七年苗疆生活最令其难以忘怀。自乾隆三年（1738）离开贵州后，又写了不少诗歌来怀念苗疆岁月。因为毛振翎在苗疆任职期间为国家平定苗疆，为古州百姓办义学、建亭立碑、建桥修路等，所以他认为当时的他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报国志向。《忆苗疆》有：

六载燕台客，黔山梦想通。诗书开绝域，金鼓靖妖风。地迥思文化，官闲忆载功。何由归旧壤，重抚百蛮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543）

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毛振翎已离开苗疆六年，但是他内心仍然对于再次像当初在苗疆做官时那样能够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抱有强烈的渴望。此时的毛振翎虽身在京城，心却与苗疆相通，回忆起当时教化苗民与平定叛乱的岁月，心中满是欣慰与自豪，进而又表达了自己重返苗疆的愿望。诗中“金鼓”、“妖风”的浑雄意象凸显了诗人的功业豪情，因为“地迥”（偏远），所以“思文化”，暗示了文治之路在苗疆这个蛮荒之地的艰难，表达了毛振翎作为文治官员的孤独。“官闲”的现世落寞与“忆载功”的昔日辉煌对比，凸显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深化了沉郁的情感基调。全诗将个人经历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既表达了对苗疆治理的深切回忆，又寄托了对边疆文化开化的期许。《峡中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8）中“霜深渐觉芳华歇”以“霜深”比喻人生迟暮，“芳华歇”代指光阴流逝、青春不再，表达自己迟暮之悲凉。诗中诗人还以“宋玉悲秋”的典故自况，传达沉郁悲凉情感。此外，《奉使开下江歌》中“督工眠食江之浒，利济生敢辞苦”（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8），展现诗人奉献边疆的慷慨，此诗还多用短促动词展现力量感，如“石碎波澄帆无阻”。《苗俗》中“顽冥无别思，世业只三农”（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53），暗含对教化无力的挫败感。

### 三、《苗疆集》的史学价值

毛振翎的《苗疆集》作为清代边疆官员的诗歌集，其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苗疆地区历史事件、社会风貌及治理策略的记录与反思。毛振翎长期任职贵州，其诗作以亲历者视角记录了苗疆的治理过程。《偕永从令陈磊峰年侄自丙妹返舟》中“青衣返棹畏江寒”（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9）等细节，揭示了苗民生活与官方政策的互动。《雍正十三年乙卯四月望，四抚提会委同游击唐，共领兵七白与清江兵会军次康，黄坡苗万众于诘，朝犯营一战溃北，赋此以志之》（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60）对苗民起义的描写细致真实，展现战争的真实场景与影响。《苗疆集》曾提及“三农”，如《苗俗》中“世业只三农”（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53），客观上反映了清廷通过推广农耕以替代苗民传统生计的治理策略。《苗姑竹枝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53）既描述苗民“坐月”婚俗的独特性，又以“顽冥无别思”暴露清代文人的文化偏见。《苗俗》中“尊夸碕酒浓”“曲说芦笙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53），记录了苗民酿酒、音乐等特殊文化。《三难滩舍舟山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5）描绘苗疆险峻地理与交通困境，也间接反映了茶马古道等贸易路线的实际运作状态。毛振翎在诗中常附自注，如《鸡贾河》注“雍正七年开八寨”（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8），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直接关联，强化了诗歌的史料功能。《中秋登武乡侯台》（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440）借诸葛亮南征典故，既抒发个人政治理想，又暗喻清廷对苗疆的教化意图，体现诗歌作为情感化史料的独特价值。

《苗疆集》的史学价值不仅在于其内容对清代苗疆历史的补充，更在于其作为“诗史”的独特意义。它既是清代官员视角下的治理实录，也是士人情感化的历史叙述，为研究中国清代边疆政策、民族关系、社会文化及文学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 结论

毛振翎的《苗疆集》以 417 首诗歌构建了一幅清代苗疆社会的全景图卷，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更在于内容书写与艺术表现的深度融合。本研究对毛振翎的《苗疆集》进行了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的还原，主要包括诗歌主题与艺术的探讨。在内容层面，诗集通过地理风物、战争叙事与士人情怀三大主题，既生动刻画了苗疆的自然险峻与民俗风情，又实录了清代边疆治理中的军事冲突与文化互动，

成为兼具文学审美与历史真实的“诗史”文本。艺术上，毛振翎善用“青衣”“豺豕”等意象隐喻族群关系，通过自注体例强化诗歌的纪实功能，并继承杜甫沉郁雄浑的诗风，使作品在叙事中渗透着士人的忧思与使命感。尽管其视角受限于清代官员的汉文化本位，对苗民形象的刻画难免带有时代烙印，但《苗疆集》仍以独特的“在场者”书写，为清代边疆诗歌研究提供了珍贵范本。最后总结出毛振翎《苗疆集》诗歌创作的史学价值：既是以文学形式记录苗疆社会变迁的“诗史”，亦是清代士人边疆治理实践的思想镜像。

### 参考文献

- [1] Xiang Yingxi & Cao Duanbo. (2023). Southwest Folk Discourse on Farming and Weav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llustrated Records of Miaos in Qing Dynasty, *Translating China*, (01), 43-52.
- [2] Zhang Wei & Wang Hao. (2021). Re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Emotional Words i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under Different Themes,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01), 548-552.
- [3] Wu Chunlei., Wang Jiangnan; Yuan Shaozu; Wang Leiquan & Zhang Weishan. (2021). Generate classical Chinese poems with theme-style from images, *Pattern Recognition Letters*, (01), 72-81.
- [4] 黎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3). 黎平府志(下), 北京: 方志出版社.
- [5] 韦凯(2024). 西方有关“苗疆”和“苗人”的知识来源——以早期耶稣会士地图为中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03), 92-104.
- [6] 陈建庚(1994). 贵州地理环境与资源开发,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 [7]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59 卷)半野居士集半野居士焚余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8] 彭雪开(2014). 永顺地名源流考, *中国地名*, (03), 55-58.
- [9] 魏源撰, 韩锡铎, 孙文良点校(1984). 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下), 北京: 中华书局.
- [10] 陆昕(2020). 清代咏藏诗词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1] 王虎, 张邦伸(2020). “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107-108.
- [12] 王军涛, 张建强(2023). 清代咏藏诗视域下的茶马古道文化谱系: 和而不同,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3), 76-84.
- [13] 胡万梅, 梁海(2020). 毛振翎和他的“西征集”, *西藏研*

- 究, (03), 107-103.
- [14] 胡万梅(2020). 毛振翎咏藏诗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5] 宋荻(2023). 清代旅藏书写的视野拓展、形态转换与文本实践,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9), 44-50.
- [16] 张钦(2020). “藏行纪程”所载滇藏交通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01), 128-142.
- [17] 张恩迅(2024). 从边界到通道: 明清时期西南的驿道、儒学与民族融合, 青海社会科学, (04), 172-180.
- [18] 王慧琴(1985). 清代贵州古州苗民起义, 民族研究, (02), 45-51.
- [19] 白林文(2016). 清代贵州“苗疆六厅”治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